

文学经典

赏析

张爱军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鲁迅 知识分子的多重选择
老舍 投水殉难的悲剧
张爱玲 文学天才的天折
曹禺 江郎为何才尽
丁玲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施蛰存 现代小说的探索者



文学经典赏析

张爱军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经典赏析 / 张爱军著.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70-0970-7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965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pankeju@126.com

订购电话 0532-8590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潘克菊

电 话 0532-85902533

印 制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4

字 数 225 千

定 价 36.00 元

张爱军曾经跟着我读硕士,毕业后到一所职业学院任教,之后便少有联系。最近突然得到她的邮件,说有三部书稿想出版,希望我给她写点文字,以充序言。这让我多少有点惊讶:一下子拿出三部书稿已非易事,而且三部书稿的内容完全超出了她上学时的专业范围:除这本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稿子外,另外两部与《孙子兵法》和中国科技史有关。由于我视野狭窄,多年拘泥于专业内阅读和思考,所以对她的两部非文学类著作不敢置喙,就答应为她这本文学类著作写点文字,权充序言。

本书内容丰富,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提出的问题也很多,显示了作者对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人命运、文学与科学关系的深入思考,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本身。鉴于本书的这一特点,我将这种不合常规套路的写作方式称为“富有个性的写作”——当然,一切有价值的写作均有个性,但在这本书中,个性色彩似乎更为明显,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有点“任性”,这对一位年轻作者来说,其实是值得鼓励的。

首先,书中有大量的经典文本细读,但作者细读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拆解文本、探求文本的艺术成就,而是通过文本细读去思考作家的精神困境,进而反思知识分子的命运。如鲁迅一章,作者通过分析《狂人日记》的文本结构,指出:“作者在文中显示了奇妙的双轨逻辑,把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紧密融合在一起,恰到好处地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作者借狂人之口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饱含悲凉,又满怀信心;浸透绝望,又充满希望,如黑夜中‘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噪’,在寂寥的旷野上飘荡。”同样,作者通过对《伤逝》

的文本细读,发现了鲁迅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矛盾:“鲁迅把启蒙主义理想叙事话语放置在现实生活中,启蒙者涓生遭遇的尴尬显示了启蒙话语与日常生活的矛盾,男性话语与女性的矛盾,反抗与回归的矛盾,思想启蒙者自身的矛盾等。”作者通过文本,进入了鲁迅的精神世界,为理解鲁迅的情感和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入口。在分析丁玲笔下贞贞这一形象时,作者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虽然贞贞不是丁玲,但是丁玲把自己的思考融入这个人物形象中,使这个形象更加富有内涵。”在丁玲的命运和贞贞的命运之间,也总有某些神秘的联系。分析《封锁》时,作者将其与张爱玲晚年生活联在一起,透视其中的苍凉感受,使人耳目一新。作者这一细读文本的思路,使作品研究上升为对作家命运的反思,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思想价值,是值得称道的。自然,本书中文本分析的内容十分丰富,并非所有的分析都采用同一思路,有些文本分析很能彰显作品的艺术匠心,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总的来说这类将文本细读与知识分子命运勾连在一起进行思考的方式,是颇为有价值的部分,很值得细细品味。

其次,本书最大的亮点,是将科学问题带入文学研究领域,使文学研究与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接续到一起,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作者有专门论述中国科学史的著作,所以这方面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使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非常到位。在论述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转向时,她较多从鲁迅与科学的关系入手,并指出:“鲁迅‘科学救国’与‘文学救国’思想的冲突,体现了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和悖论。”她不只是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带入文学研究,还把一些科学案例跟文学叙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有时让人觉得突兀、乖张,但仔细推敲,也别有一番意味。在论述施蛰存的时候,作者以施老之名借科学之力贬斥了当今纯文学研究的弊病,随后分析了生物学家饶毅科普著作的价值,最后再回归到施蛰存小说的研究上来。在分析《现代》杂志时,从其广告入手,分析它对西方现代科技的崇拜,并认为它“体现了施蛰存的全球性视野以及现代性追求”。这种引科学入文学、反思文学研究的做法的确能给人带来很多启示。在对《倾城之恋》的解读中,作者从文学家讲故事说到科学家讲故事,从文学形象分析到科学家绘制的“平均脸”,使文学研究融入了很多科学的元素;作者在文学研究中掺入大量科学元素,明显是一种自觉追求。在第七章讨论莫言的时候,核心问题就出来了:“莫言获奖与‘两种文化’的反思”。当年斯诺在《两种文化》的演讲中指出:“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两种文化》第4页)事实上这一鸿沟至今也没有填平。由于中国教育的分科和大学院系之间的壁垒,这条鸿沟越来越深。文学知识分子基本不懂科学,科学知识分子懂文学的也不多。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结合莫言获奖事件和莫言作品对“两种文化”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批判与反思,我们可以不同意她的一些说法,但这种思考是有价值的。

再次,本书在写法上也很有特点,那就是思维跳跃,语言犀利,信息量大,文风自信。读这样的文字,像坐在过山车上,时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如在分析《倾城之恋》时,作者采用了张爱玲小说惯用的蒙太奇手法,将童世舫和长安瞬间转换为物理学家邢志忠和他的妻子以太·曾,进而发出感慨:“这是一个男性控制的世界,即使女性是主动的,也是主动要求男性的控制。”从文学到科学,从小说到现实,从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到现实中一对恩爱的夫妻,看似天马行空、无迹可求,但细细思量,又不能不承认,在这些毫不相关的事件背后,积淀着相同的文化淤层。在谈到叶圣陶提携丁玲的时候,一些相似的事件也随之涌出:“法拉第成为科学家是因为戴维的提携;小沈阳声名鹊起由于赵本山的强推;老舍成为艺术家受惠于宗月大师的资助”。信息的堆叠有时让人疲劳,但也确实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在论述《原野》中焦阎王这一“缺席的在场者”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主人公的缺席在场,也是西方文学常用的手法。卡夫卡的《城堡》有个权力的化身克拉姆,人人都听说过他,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人们对他充满迷信与崇拜;土地测量员K想见到他,但是关隘重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1948年的小说《1984》,有个无所不在但又从未现身的大大哥。”这种出人预料的联想,能够给人别有洞天之感。

自然,作为一位尚未成熟的写作者,其著作不可避免地存有某些需要提高的地方。如过于跳跃的思维、偶尔跑偏的论述,有时收拢得并不从容,反而冲淡了文章论述的核心议题。过高的自我期许和试图一揽子解决自己思考的一系列问题的迫切心情,也容易使文章的主旨显得飘忽,不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自有其值得珍视的地方,我也愿意推荐给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我更期待作者的写作慢慢走向成熟,做到思维缜密、行文从容,从一个一个小问题谈起,再去解决那些大问

题。张爱军是一个勤奋的人,从这本书中就不难看出她丰厚的阅读积累,我相信,通过她的努力,今后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澳门大学博士生导师

张全之

2015年4月4日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 知识分子的多重选择 / 1

鲁迅的转向及其影响 / 1

《狂人日记》的文本分裂性 / 15

《伤逝》启蒙话语的局限性 / 18

幸福和荒诞同是地球之子

——永不停息的《过客》/ 23

鲁迅的“狂人”与契诃夫的“疯子” / 27

语言的困境

——鲁迅经典文本分析 / 34

第二章 老舍: 投水殉难的悲剧 / 45

老舍死亡之谜 / 45

《骆驼祥子》与老舍的文化立场 / 57

张大哥、老李与小赵

——《离婚》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 63

“他的世界被狂风吹了走”

——《断魂枪》的现代性焦虑 / 70

从米兰·昆德拉到老舍的幽默 / 73

第三章 张爱玲: 文学天才的天折 / 79

张爱玲的天才梦与人生传奇 / 79

《金锁记》中的假面人生 / 85

故事的不同讲法

——《倾城之恋》与两种文化的解读 / 91

现代叙述视角下的说书人传统

——《茉莉香片》叙事学分析 / 99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悖论 / 105

第四章 曹禺：江郎为何才尽 111

明白了，你却残废了 / 111

人类命运的悲剧

——《雷雨》中的天命思想 / 120

神秘、野性、文明的哀歌 / 131

繁漪、陈白露与愫方

——兼评曹禺的思想变化与角色错位 / 139

第五章 丁玲：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 149

《莎菲女士的日记》与丁玲的革命 + 爱情 / 149

沙漠似的广，清水似的清

——不同的丁玲与《我在霞村的时候》 / 156

雕塑一般的人物群像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细读 / 164

政治与文学的悲喜剧

——从《牛棚小品》《杜晚香》看丁玲的后期思想 / 177

第六章 施蛰存：现代小说的探索者 / 185

学贯古今中西的“洋场恶少” / 185

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 / 196

高僧鸠摩罗什的罪与罚

——读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鸠摩罗什》 / 209

后记 / 216

第一章

鲁迅：知识分子的多重选择

鲁迅的转向及其影响

鲁迅去世前两年曾写过几百字的自传，简单介绍了自己求学、工作、写作的生命历程。鲁迅 1881 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姓周的大家族，祖父是进士，父亲是秀才，母亲自修到能看张恨水的小说。鲁迅十三岁时，家庭遭遇了一场大变故，由小康陷入困顿。因为没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鲁迅相继在南京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学习自然科学；然后去日本学医，最后弃医从文。后来又因为钱的关系，鲁迅的母亲和弟弟周作人需要经济资助，鲁迅于是回到了国内。

鲁迅因为思想性格、文学创作等原因，和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多次被追杀、被通缉，作品也经常被封。鲁迅后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既有进士和秀才的遗传基因，也有环境对他的塑造。

一、第一次转向：科学与文学的冲突

据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回忆，鲁迅幼年时就喜爱自然科学，当时没有现代科学读物，鲁迅只能读《释草小记》《释虫小记》《花镜》等讲昆虫和植物的古书。鲁迅喜爱植物学，不但自己种植物，选修植物学课程，制作植物标本，而且鼓励周建人学习植物学，在日本时曾送给周建人几本关于植物学的书，还有一架解剖显微镜。直到晚年，还带病翻译《药用植物》一书，而且计划和周建人共同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可惜未能如愿。

鲁迅由科学转向文学的标志，根据鲁迅的自我描述，应该是发生于 1906 年

日本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本中，鲁迅详细描述了这件事对他的心理刺激。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做了俄国的间谍，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赏鉴这盛举的中国人发出了欢呼的声音。这种情形正是鲁迅后来所说的“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个事件是青年鲁迅的创伤性体验，这次创伤使他完成了由科学到文学的激变。鲁迅一生有过多次思想转变，这些转变在鲁迅的文本中总能找到一些标签。最初的科学救国梦是因为家道的衰落和父亲的病，鲁迅有四年多出入于当铺和药店里，然而S城的名医用芦根、败鼓皮丸、原配的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都没能治好鲁迅父亲的水肿。鲁迅在此过程中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他要走异路，逃异地，躲避S城熟悉的嘴脸，寻求别样的人们。于是考入矿务铁路学堂，去南京学开矿，从“四书五经”转学矿物学、地质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为日本求学期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让青年鲁迅感到忧愤深广，他感叹“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非左操刀右握算，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①。

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鲁迅赴日本留学，为了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又因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鲁迅去日本乡间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这期间，鲁迅发表了科学论文《说钋》，介绍居里夫人发现镭的过程；翻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以及未发表的《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论》。这期间的种种译著，都可以看出鲁迅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以及通过科学实现救亡图存的梦想。“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有一个重要发现，这个发现贯穿他以后文学创作的始终，那就是通过文艺运动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这使他的科学救国梦转向了文学救国梦。

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几篇早期文章和后期思想有明显不同，《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皆用古文写成，佶屈聱牙，生涩难懂，这和后期力倡白话，甚至主张“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虽然是提倡文学运动的开始，但是这几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皆涉及科学。

《人之历史》主要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说中国近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和进化

^① 鲁迅. 鲁迅全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

论有关的内容也很常见。鲁迅最初接触进化论是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最初传入中国，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物竞天择”的思想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找到了“科学”依据，也让鲁迅看到了落后民族的精神危机。鲁迅认为进化有人择和天择两种，人择出人意，天择是由于生物的生存竞争，在不知不觉间进行。鲁迅相信人类出现之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如飞矢一样不可停止。在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中，也有明显的进化论思想，鲁迅用人的不同进化之路，分析吃人的人与不吃人的人之间的不同，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因为他相信新的胜过旧的，年轻的超过年老的，后起的胜过以前的。但是后来鲁迅的进化观遭到了轰毁，他在《答有恒先生》中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在《孤独者》《长明灯》《颓败线的颤动》等篇中，孩子用一片类似钢刀的苇叶等“拟语言”符号，向先觉者、精神界战士、养育他们的亲人喊出响亮的一声“杀”。青年人的表现让鲁迅的进化论思路因此轰毁，过去他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①。

《科学史教篇》是发表于1907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是鲁迅科学思想的总结。如果说《人之历史》注重科学知识的介绍，《科学史教篇》则更注重科学精神的提倡，这是“幻灯片”事件之后改造国民精神的序曲。鲁迅对科学的定义是“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因此科学精神是上天入地、勤于探索的精神，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产的重要力量，是历史发展的“本根之要”；是“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的精神^②，追求真理是它唯一的目的。和洋务派重视学习西方技术、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着重引进西方船坚炮利不同，鲁迅更看重理论科学的研究。他在列举了西方大量科学成果之后，认为这些技术成果都是理论酝酿已久的结果，有了理论必然会产生社会效益，“实益乃昭”，理论和实用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这个问题涉及鲁迅对物质的悖论态度。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认为西方文明的弊端是“物质也，众数也”，过于重视物质，众人以多欺寡，致使一切

① 鲁迅. 鲁迅全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

② 鲁迅. 鲁迅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6.

事物无不质化；灵性被遮蔽，人性被异化，社会进步停滞，诈伪罪恶产生，这是十九世纪文明的通病。因此解决的办法是“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反对物质主义、提倡个人主义”。鲁迅写此文时世界大战还未爆发，他预见到了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过度膨胀对精神产生的抑制作用。青年鲁迅对物质主义的反思在互联网时代有更深刻的意义，科技在影响、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人类一方面享受着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好处，同时又陷入技术膨胀导致的人性异化，各种非物质的人在虚拟空间宰制着人类的生活。鲁迅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文化，鲁迅认为传统文化存在“尚物质而疾天才”的特点，对于科学技术，古人本来就有重技术、轻科学的倾向，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过分看重西方的物质文明，那就会“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①。鲁迅反对物质主义，并不完全否定物质进步对科学的促进作用。鲁迅假设今天置身于野人之中，不但没有显微镜和天平，也没有试管和酒精，科学家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那就只有纯学理的思考；而缺少实验的物质基础，正是古希腊科学衰落的原因。

在鲁迅的早期论文中，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充满矛盾的。和《狂人日记》之后激烈的反传统不同，青年鲁迅对传统的态度是温和的，这主要源于他少时喜阅读古文和老师章太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阅历相对单纯，对中国的现状还没有深刻的洞察。即使经受了“幻灯片”的创伤，发生了救国梦想的激变，他仍然对社会与人性怀有天真的梦想，相信通过文艺运动便可达到救世的目的；依靠几个摩罗诗人、精神界战士便能改变国民劣根性。这时，充满毒气与鬼气、多疑与绝望的鲁迅思想还没真正形成，他的古奥晦涩的文字中饱含青春的激情与爱国的梦想；他的青春与梦想要在残酷的现实中一点点被剥夺榨取，直到去世前他的体重只有30多千克，直到他发出“一个也不饶恕”的咒语。

鲁迅23岁时曾在断发照后面题“七绝诗”，表达“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理想，这种理想在他的早期论文中像火山爆发一样激情四射：“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他歌颂祖国的典章文物、轩辕苗裔、敬天礼地，他对传统的态度有一份理解和同情。他认为评价古代文化的正确方法，是拿同时代的另一个民族相比较，而不是用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

今人与古人相对比，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种把罪恶归结于传统思想，甚至斥责文言为野蛮，鄙视其思想简陋，准备用西学代替传统的人是错误的。对待外国文化与传统思想的正确态度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汲取当今的先进思想，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另外建立一种新思想。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赞美并不表明他有复古倾向，他热爱祖国的文化但也看到了其弊端：“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撓人心”，因为目的在不震撼他人，不触犯他人，所以要让人心如槁木，要无为而治。如果有人敢于“撓人”或“撓我”或“得撓”，那么就会“为帝大禁”“为民大禁”。皇帝的目的在于保位，民众的目的在于安生，他们都宁愿堕落也不愿进取，如果有锐意进取的天才人物出现，必定会“竭尽全力死之”。因此，鲁迅呼唤能够作“至诚之声”“温煦之声”的精神界战士，“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援吾人出于荒寒者”。

如果说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对老子的批判，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目的是为了呼唤“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摩罗诗人；那么发表于1935年的《出关》则有后现代主义色彩，文章用油滑、戏谑的笔调把老子戏弄了一番。老子因为孔子几句话便要西出函谷关，在出关时被关官尹喜捉住，建议其讲学，老子被迫编了讲义《道德经》。文章发表后，鲁迅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回应批评家的批评，鲁迅主要列举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以为《出关》在攻击某个人，这种影射性批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在少数；一种则认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把鲁迅当作文中的老子，这种阅读法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也很盛行。《摩罗诗力说》和《出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前期的否定隐藏着改造的热情，古朴的文字里有对传统的迷恋；后期则有后现代主义的虚无色彩。“老子像一段呆木头”，“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后就不再来，也再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看出对圣人的解构、对传统的颠覆。鲁迅对传统的态度在早期和“五四”以后有根本的区别，用“反传统”概括鲁迅的文化立场是不恰当的。鲁迅的文化态度从保守到激进的变化是和时代大潮一致的，后世对鲁迅的接受史也和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有关。

弃医从文之后的鲁迅发表的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虽然和科学有关，但是它们只是医治国民精神的手段。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对科学精神推崇备至的同时，认为“科学发现常受超科

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谓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这种“非科学的理想”是和科学无关的，“五四”时期新文化先驱往往持有“非科学的科学理想”，去寻求建构现代国家与人类生存的出路，科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时期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谈到“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时，曾经以这样的言论布告天下：“……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由此可见，“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不是目的，只是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药方。

鲁迅提倡用文艺运动救治中国人的精神，而不是用医学手段医治他们的身体，对精神的重视使他把文学的重要性置于科学之上，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轻视科学的思路，这对后世知识分子把科学与文学当作启蒙手段，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做社会的批判良心有深远的影响。“五四”时期，鲁迅建议《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两篇纯粹科学文章即可，但是不要太多，而且对于中国的老毛病无论如何总要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鲁迅的建议可以看出宣传科学知识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讲科学来针砭时弊，鲁迅式的科学杂文在当今科学圈很盛行，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老毛病依然存在，需要科学家不时刺他几针；同时也可以看出科学家的杂文偏好，春秋笔法，继承了鲁迅的遗产。

鲁迅“科学救国”与“文学救国”思想的冲突，体现了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和悖论。现代性是一个自我否定、自我反思的未完成的过程，包括社会的现代性与文学的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相信启蒙理性、科技进步能够带来历史的发展与人类的幸福，文学现代性则反思科学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鲁迅相信科学的作用，现代社会的一切“无不蒙科学之泽”，“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只要有科学家在，内可以振作其国人，外可以震怖其外敌。但是鲁迅又怀疑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文明容易造成文化的偏执，人性的遮蔽。

二、第二次转向：文学与政治的矛盾

鲁迅放弃了“科学救国”的梦想，开始了文学救国的道路，这次转变看似“幻灯片事件”产生的激变，其实那次事件只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标志，成熟的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还未形成。在弃医从文之后，发表早期论文的1907年，鲁迅和几个同志创办了《新生》杂志，《新生》失败之后，1909年鲁迅回国，开始了他的十年沉默期。鲁迅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这期

间，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南腔北调集》自序）。于是鲁迅用各种办法麻醉自己，抄古碑，读佛经，沉入国民，回到古代。直到钱玄同对他的古碑抄本产生质疑，开始了那场关于铁屋子的对话。

鲁迅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他创造了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一系列文学经典形象，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底层命运的关注，对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反思，增加了思想主题的复杂性。小说的横截面式叙事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模式；对多重叙事策略的使用，创造了现代叙事学的巅峰。对人物内部心理的刻画，颠覆了传统小说注重外部世界的表现方式。《野草》中的现代主义色彩，体现了其文学创作的创新性。但是鲁迅的小说创作，毕竟是“铁屋中的呐喊”，有很强的目的性：毁坏这铁屋子，拯救社会，唤醒民众，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在追求社会现代化的启蒙功利性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审美趣味之间，文学工具与创作技巧之间，个人的寂寞、悲哀与聊以慰藉他人的呐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张力，增加了鲁迅文学创作的心理痛苦，“生命与死亡，希望与绝望，呐喊与彷徨，离乡与还乡，开口与沉默，冻灭与烧完……”一直是他作品中存在的悖论命题。

鲁迅的“文学救国”梦其实是“科学救国”的延续。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写道：“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学医出身的鲁迅即使进行文学创作，其文学语言也带有科学语言的特征，科学背景使其思想主题更加阔大，语言也摆脱了文人的无病呻吟。但是鲁迅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民众、救国图强，他的启蒙主义思想赋予文学过多的功利色彩，和梁启超通过小说改良社会的文学工具观没有根本的区别，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被赋予过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思考，文学绑上了政治的战车，成为新文化先驱寻求社会现代化，建构现代化国家的工具，可能对小说的文学性、审美性造成一定的损伤。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作家急欲改革社会的热

忱,以文学手段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责任,对作品的文学素质是很大的破坏。应该说夏志清的评价比较中肯,除了通过小说创作教导自己蒙昧的同胞,鲁迅时刻不忘社会现实的启蒙精神在他的优秀作品中时有体现。《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在《阿Q正传》中鲁迅从传的名目谈起,顺便点名讽刺了攻击白话文运动的林琴南,创办《新青年》提倡洋字的陈独秀,有“历史癖考据癖”的胡适之。在拷问知识分子灵魂的代表作《孤独者》中,他在文中突然插入一笔对《沉沦》的作者给予辛辣的讽刺:“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这种时刻不忘影射现实的杂文笔法使他的小说总是与现实有某种紧张的对立,对其艺术的完美性是不可估量的破坏。

日本作家伊藤虎丸曾经说过:“对于明治以前的日本人,中国文学在所谓同时代的意义上是深切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在我们日本人眼里变得索然无味是近代以后的事。”^①中国古典文学曾经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近代变得索然无味除了经济落后影响了文化地位,文学自身也有无法回避的责任。近、现代作家急于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把文学当作手段和武器,出现了审美的硬伤和缺憾,致使其文学趣味大大降低。夏志清也认为“比起西方传统,现代中国小说在行文运事、思想辩难,以及心理深度方面,均远有不逮”^②。

和古典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落后的原因是多重的,把文学当作建构现代民主国家的手段是重要原因之一,激烈的反传统立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鲁迅研究专家张全之先生认为现代文学是离家出走的文学,是以反传统为基本立场的文学。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从日本时期对传统的赞美,到“五四”时期对传统的否定,中间经历了幻灯片事件和归国后的十年沉默期;20世纪20年代中期又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婚恋风波、兄弟失和等事件。鲁迅的思想从呐喊到彷徨,创作倾向也在不断发生转化,由小说、散文等纯文学创作,到匕首投枪似的杂文创作,之间的转向经历了复杂的思想

① [日]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

②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J].当代作家评论.2005:4.